

# 世界大舞台

[美] 卡尔·瑞贝卡 著  
高瑾 等译

The image shows a dense, semi-transparent watermark of the book title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repeated multiple times in different sizes and orientations (rotated 90 degrees counter-clockwise) across the entire page. The text is in a serif font, with 'THE FRONTIERS' in a larger, bold font and 'OF ACADEMIA' in a smaller, regular font.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 世界大舞台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 /  
(美) 瑞贝卡著；高瑾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10  
(学术前沿)  
ISBN 978 - 7 - 108 - 03022 - 1

I. 世… II. ①瑞… ②高… III. 民族主义－研究－中国－  
近代 IV. 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1979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封面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 - 2007 - 43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9

字 数 202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 中文版序言

《世界大舞台》的英文版 2002 年出版，从那时起，我多次向学生、同事以及不畏艰涩阅读了这份文本的家人和非学术界的朋友们介绍过这本书的内容。我发现最有效的解释方法是在开始的时候说明：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连字符（“—”）的用法，即英语表达中“民族—国家”中间的那个特定的连字符，它是如何成为一个被自然化了的等号。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大约从甲午战争到 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这一自然化过程是如何开始、如何完成的。这是一部知识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或制度史。

这些年来，我不得不针对各种关于这本书的批评进行自我辩护。我对某些具体的批评（其中有些根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敌意）不是那么在意，我更感兴趣的是阐述论点建立的前提。然而，我一再遇到同一种误解，所以，借此机会我要加以澄清：很多读者似乎把我的观点理解为，在历史或者理论层面，民族主义（nationalism）涵义中的“民族”（ethno-nationalist）和“国家”（statist-nationalist）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绝对可以分离而且互不交叠的。我在本书中阐述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把这两个概念分

开，从而启发性地探讨一个我认为是被掩盖了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也就是，民族和国家是如何合二为一的：连字符的问题。写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寻找这两者在二十世纪早期融合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与理论逻辑。不把这两个概念分而论之，就只能延续把它们混为一谈的习惯。由于我要讨论的正是这两个概念合并而引起的问题，所以只能把这两个实际上高度重叠的历史和理论的术语与过程在概念上做出区分。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方法上的、理论上的和历史上的解决办法。

此外，我还想对中国的读者做几点说明，你们可能认为我论述中国历史时不那么正统或者说与在中国通行的方法非常不同。首先，这本书的视角不是“西方人”（美国人）看中国历史，而是学者对一个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和其他地区都出现的历史问题的关注。毫无疑问，美国女性这一身份影响了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如何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但是对我的论述的分析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身份的层面上，那就是过于执迷自恋的身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念头——这两者我都拒绝，它们都不能定义我，也都是我在书中明确反对的。的确，我对世界和历史的基本理解是政治的（有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或者固执己见的，我称之为系统的和原则性的）。这一政治理解是一个镜头，通过它，我读取中外古今的文本和历史情境。

第二，我关注晚清历史，但我的关注并不仅仅是自我指向的，也就是说不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在这本书中，我把这个时期看作一个延展的历史时刻，在这一时期中，可比性（过去和现在、中国和非中国，等等）在中国处身世界的思想和存在中成了无法避免的。在某种意义上，正如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所说，可比性不可避免，因为即使你对世界不感兴趣，世界还是会对你产

生兴趣。这一被强加的纠缠，是我解释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历史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另一重意义上，可比性的不可避免另有理由。虽然没有什么文本仅仅是文本，在晚清，文本也不再可能只与中国相关。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是被置于世界中的——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帝国主义以及知识和实践的全球流通，中国被明确和暴力地置于世界之中。中国同时也通过文本被隐讳地置于世界中，因为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们敏锐地经历和感受到了挑战。当然，中国一直是在世界中的。然而，本书的论点是，到十九世纪晚期，世界的性质和它在中国的历史力量就已经被认识到，而且已经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到了晚清，这些新的意义出现并融合进了对于“中国”这个概念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理解中。因而，从某种本质的意义上说，当时由中国人书写的文本当然是中国的，但它们又不仅仅是中国的：它们总是已经全球化了，并因此成为同时代世界的活文本，而不再仅仅属于一个封闭的中国。这并不是说那时的中国人在书写文本时不是作为中国人来写作——他们当然是中国人；但是，他们那时书写和我们现在作为历史学家阅读的文本，必须被放在一个被强加的同时代的全球可比性环境中来阅读和阐释。

本书强调，到了晚清，在我们的历史文本分析实践中，把“中国”和“非中国”在阐述中分开并无用处。虽然具体化了的中西或者中、日、西方的分立还是很受欢迎，这在文本和历史层面都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对这种分立的欢迎只是倾向于巩固某种与当时世界的复杂性无甚相似的意识形态世界观。

从更加抽象的历史哲学角度来看，可比性之所以在晚清成为不可避免，恰恰因为它是作为全球时空秩序的现代性的形成条件。也就是说，现代性总是关于比较的，并不只是空间的比较

## 世界大舞台

(他们对比我们)，更重要的是时间性问题。这个时间性问题是作为历史之中一个问题出现的（均质化和总体化的过去对比新的、不同的现在与将来），也就是说是历史中的（in history），也是历史思考中的。但它出现的形式是历史的（of history），也就是说需要被超越、被征服、被解决的问题。现代（作为历史的时间化）是系统地、体系地引入这些问题的第一个时刻。本书认为，中国是在晚清时期开始试图思考这些问题。

我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遇到赞同和反对它的读者，希望它能激发讨论以增强我们历史化地思考和研究历史可能性的能力。我不是功能主义者，我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和“效用”有什么关系，那不是我对待学术的方式。本书是否符合某种利益不是题中之义。当然，在美国工作使我能够对学术研究怀有激情又保持距离。希望大学的公司化步伐，尤其是在我工作的纽约大学，不会剥夺我和我的同事的这份奢华。我们还是往好的方面想吧。

最后，我还要衷心地感谢长期的朋友和同志汪晖，他组织并主持了全书的翻译；感谢清华大学汪晖课上的许多学生，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把本书翻译成了中文；感谢三联书店编辑叶彤一直关注中文版的出版过程；感谢我在 NYU 的研究生高瑾和朱茜，她们校核修正了译文，并且费了很多力气从我杂乱的文档中查找引文和脚注。没有这些跨越了数年光阴和数千公里距离的努力，这本书的翻译是无法完成的。我还要向王元化先生表示我特别的谢意，他在 15 年前接纳了我，一个年轻的外国学者，就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和我进行极其认真的讨论和争辩。能够遇到这样一位重要的老师、苛刻的对话者和非常好的人，我非常幸运。

2008 年 1 月 30 日于纽约

## 前　　言

1986 年，我在湖南教书时遇到了一些菲律宾共产党员，1960 年代末暗杀马科斯总统的计划败露后，他们逃离了菲律宾。他们把强大的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天然的同盟和历史的榜样。在“文化大革命”鼎盛时，他们到达中国，在北京被毛泽东接见，作为革命同盟兄弟受到欢迎，并在长沙得到政治避难、住所及工作。20 年来他们在那裡抚养自己的家庭，同时竭力保持团结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遇见他们的时候，这些感情，至少是与中国有关的那些，已经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屡屡的绝望。就我所认识的费尔南多而言，尽管他对中国的情况已经失望，但他仍然坚信菲律宾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阿基诺的“人民权力”运动推翻了马科斯政府时，费尔南多认为这是他回国实现理想的良机。1987 年 2 月的一个寒冷夜晚，费尔南多离开了长沙。尽管那些在另一个年代里曾经是他热情主人的人们都刻意回避了，他的朋友们还是聚会为他饯行。大部分的流亡者对阿基诺政府不像费尔南多那样乐观，他们留在了中国。几个月后的一次聚会上，我得知费尔南多已被阿基诺的军队处死，他的妻儿

正在南方避难。

回顾起来，这项研究的最初动机可以说来自我与费尔南多和他的菲律宾革命同志的交往，因为它追溯的是使一种关于并置身于这个世界的革命的对话在中国具有了可能性和重要性的历史条件。然而本书所专注的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种可能性最初产生的契机。在这个对话形成的时刻，它周围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不均衡现代性的世界：随着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在反殖民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崛起，这个不均衡现代性的世界方才初次进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活动家的视野，这是从他们的角度逐渐开始形成的对这个殖民世界的理解。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提出了世纪之交的这个全球性历史时刻是与中国1895年后知识和社会危机概念性地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话语结构和精英取向，它对中国民族主义最初的表述起了关键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含蓄地哀悼了学术界和全球范围内书写和构筑更狭义的历史叙述的热潮（这种热潮促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规范性历史）对这个中国历史的宏大时刻的覆盖。然而本书也承认，那个全球性的历史时刻已经过去，目前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的和民族的行动主义的时刻。

很久以前，我带着对这个论题的朦胧的伤感情绪，开始了这一博士论文课题的研究。我研究生期间在杜克大学学习，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严格地，更重要的是不带丝毫伤感情绪地（尽管很同情地）指导了我。他帮助我完善论文的理论取向，提炼可以建立和阐发这些理论的撰史学与史学的问题。我深深地感谢阿里夫对我以及我的论文的倾力帮助。另外，我感谢我的论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安得

鲁·戈登（Andrew Gordon）和凯伦·维根（Kären Wigen），感谢他们对最初阶段的论题研究、理念与写作的坚定支持。杜克大学的持续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感谢杜克大学历史系、亚太研究所和研究生院。最后阶段，因为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赞助研究办公室提供的夏季奖学金，我得以在北京和东京为这本书完成了研究工作，此外，1998年春天纽约大学免除教学的学期为我开始重写提供了时间。

多年来中国的北京大学图书馆1911年前期刊部、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南京大学图书馆、江苏省图书馆期刊部以及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热情地应答了我大量的需求。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现代历史研究所档案处在我的研究最初阶段对我帮助很大。日本的东洋文库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东京市立图书馆都提供了有力协助。在我国外研究期间帮助我的众多人士之中，我尤其感谢徐秀丽、于克平、王烈（北京）；滨下武志、近藤 Kuniye、Kanada Shinji、Wada Haruki（东京）；鲁哲、杨坚雅（南京）；常朋远、Ursula Richter（台北）；郭须银、布桂林（上海）和 Danny Kwan（香港）。

这个项目最开始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Durham 构想和撰写的，之后在佛罗里达的 Gainesvill、纽约市、纽约州的 Hurley 又重新构思、重写。我非常感谢 Bruce Cumings（那时他在西北大学，现在在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研究系及纽约大学 Kevorkian Center 的访问学者 Huri Islamaglu，他们在我重新构思论文之后邀请我就这个论文的部分内容做了演讲。我还要感谢许多同事和朋友，在 Durham 的 Michael Hardt, Cesare Casarino, Neferti Tadiar, Jon Beller, Sara Danus, Stefan Jonsson, Joanne Filley, Wan Shuping, Hwang Dongyoun, 唐小兵以及张旭东。在

## 世界大舞台

Gainesville 的 Louise Newman, Mark Thurner, Xathryn Burns, Maria Todorova, Holly Hanson, Kiran Asher, Susan Hegeman, Phil Wegner, Sheryl Kroen。还有行踪不定的 Peter Zarrow, Caroline Reeves, Giovanna Merli。

到了纽约大学以后，同事们的慷慨深深感动了我。我尤其感谢 Harry Harootunian, Marilyn Young, Moss Robert, 他们曾经读过并和我讨论过书中的每一章，这只是他们对我的帮助的一部分。我还要感谢 Joanna Waley - Cohen, Louise Young, Meg McLagan, Hyon - Ok Park, Christina von Koehler 和 Zia Jaffrey, 他们在知识和生活上给了我很大帮助和支持。我感谢 Yva 和 John 为我提供的住宿；Ken Kawashima 和 Katsuhiko (“Mariano”) Endo, 在 1998 年夏天及以后，他们意志坚定地照顾我的情绪。我尤其还要感谢 Kristin Bayer 帮助编定的书目和她的无私帮助。还要感谢 Marilyn Young, 张旭东, Louise Newman, 他们阅读批评了我的初稿。

我的编辑 Ken Wissoker 选的审稿人很严肃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工作，他们敏锐的意见和建议对我的修改有很大帮助。我也非常感谢责任编辑对我的文字的努力修改，当然书中保留的内容由我负责。

最后我要怀着爱和感激来答谢 Christophe, Sophia, Nora, Tepi, Channa 以及他们的父母—— Deborah 和 Bob, Judith 和 John 这些年来对我的爱和给予我的欢乐；我还要感谢我的姑姑 Dotte 和已故的 Jo 阿姨对我的慷慨。最后，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 Dolores 和 Frederick Karl，因为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这么多年来关爱、鼓励和支持的感激之情。

#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前言 ..... 1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导论：关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变化的视角 ..... 3

第二章 世界大舞台 ..... 35

## 第二部分

第三章 非区域化政治：太平洋和

夏威夷作为中国民族空间 ..... 71

第四章 识别殖民主义：菲律宾人民及其革命 ..... 113

第五章 推崇民族：布尔战争和民族话语 ..... 161

## 第三部分

第六章 亚洲之世界舞台上的表演 ..... 209

世界大舞台

第七章 重新创造中国之世界 ..... 247

结语 ..... 268

译后记 ..... 276

本书译者 ..... 278

卷一  
世界大舞台

卷二  
重新创造中国之世界

卷三  
结语

卷四  
译后记

卷五  
本书译者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 第一部分



中庸道了农官集邮者得之于海内两个互不相关的一点，是本题所意在的。本书中，我着手讨论（第一章）之后，又去研  
究“政治”这个概念，从而开始研究民族主义。

## 第一章 导论：关于现代中国民族 主义的变化的视角

政治主要是关于一个舞台的和那些在舞台上的存在和身份的冲突。首先必须明确这个舞台是为一个看不到它的对话者所用，看不到它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这个舞台并不存在。<sup>[1]</sup>

本书追溯的是一些构成民族主义话语的中心概念在中国产生的过程，集中讨论这些概念以及民族主义的话语和理解是如何在晚清第一次被系统地、全面地加以阐述和讨论。在最宽泛意义上，本书把这一历史时期视为一个概念的汇合的逐渐狭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在中国的语境中把民族主义定义为一个知识导向的一系列不稳定的历史化的建构暂时稳定了。追溯起来，这一过程从最初广泛的全球或国际主义的认同时期（1895—1905）通过逐渐约简成为追求国家力量而进行的种族革命的概

[1] Jacques Rancière (雅克·杭谢和),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意见不一：政治与哲学》), 英文译者 Julie Ro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26.

念（1905—1911）。这个概念的狭义过程的成果贯穿了推翻王朝体系（清王朝）以及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的基本意识形态的前提。

具体来说，这本书集中讨论在这个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着严重的思想、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时期，中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是如何在概念上与它周围的世界，尤其是与当时非欧美地区正在出现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相联系的。我也指出这些特定的联系最终只是短暂的，但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假定是：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与其他非欧美地区的越来越强的认同最初使得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有结构的总体显现出来。<sup>[2]</sup>我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基本意识形态构成成分最初是通过与这一总体性相联系而发展出来的，这一总体性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断被创造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表述、力量的不均衡。本研究在一种交互重叠的（而非线形叙事的）结构中分析了当时公众可以看到的刊物、社论和历史著作中三个最显著、最有争议的概念建构的范畴：全球与国家空间之间、革命过程和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以及种族、公民身份与国籍之间新近被表述的关系。

这个研究不是像通常那样从欧、美、日的哲学、制度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的角度出发专注于世纪之交的世界“舞台”（stage），而是把视线转移到与之紧密相连的另一个舞台上，这个不稳定的舞台是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一次“后拉丁”美洲

---

[2] “总体”在这里的用法借鉴了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 Symbolic Act* [《政治无意识：叙述作为社会象征行为》]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指“在它产生过程的层面被重新整合的，这个过程不是随机的而是能够被描述为一个自身完善的功能运作”（56页）的文本和表现的复合体。